

半个世纪前一次意义深远的农村经济调查

产生了我国现代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团体

陈翰笙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

史学经济学报

85.8.19

当代经济学家中，为什么无锡人特别多？薛暮桥、孙治方、钱俊瑞、王寅生、张锡昌、秦柳方等，都是无锡人。无锡邻近县也出经济学家，如江阴的姜君辰、溧阳的狄超白等。这当然同无锡地区早在民国初年经济和文化教育就比较发达有关。但无锡地区出这么多经济学家，直接原因，却是半个多世纪前，曾从无锡开始，进行过一次意义重大的农村经济调查。那次调查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是著名历史学家和农村经济学家陈翰笙。他，也是无锡人。

一八九七年出生于无锡一个教师家庭的陈翰笙，早年留学美国和德国。一九二四年他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应蔡元培校长聘请，到北京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并在李大钊和于树德的介绍下，参加了革命。一九二七年李大钊、高仁山、张抱兰被张作霖逮捕，陈翰笙被迫流亡苏联，在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工作。这期间，在第三国际和中共党内，发生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任务的大辩论，这是一场关系到中国命运的大是非的辩论。

陈翰笙在莫斯科时，曾与农民运动研究所东方部长马季亚尔辩论中国农村性质问题。马季亚尔认为“中国早已进入资本主义”，陈翰笙则指出中国还是停留在商品资本阶段。在此之前，陈翰笙曾于一九二七年初同蔡和森在北京彻夜长谈，从他那里了解到彭湃在海陆丰发动农民运动的情况，深感农村问题是中国人民革命的根本问题。因此，一九二八年陈翰笙到上海，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职后，就把调查我国经济，列为重要课题。

陈翰笙认为：“江南、河北和岭南是中国工商业比较发达而农村经济变化得最快的地方。假使我们能够彻底地了解这三个不同的经济区域的生产关系如何在这里演进，认识这些地方的社会结构的本质，对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序，就不难窥见其梗概，而于挽救中国今日农村的危机，也就不难得到一个有效的设计。”因此，“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先从这三个地方着手，才是扼要的办法”。这正是他首先选定江南的中心地区无锡作为调查工作的出发点的原由。

在调查开始之前，陈翰笙首先组建调查队伍。他主要通过在上海、无锡就地招聘，吸收了一批有一定文化程度的青年人。其中有大半是毕业生或肄业生，有高中生，也有一些小学教员等。在制定调查计划时，他把重点放在农村生产关系及借贷之类经济关系上，而不象当时有些归国留学生或在华外籍教授那样，只是把农业生产列为调查重点，根本不调查生产关系。经过充分准备，陈翰笙、王寅生于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九月，率领四十五人的调查团，到无锡农村作调查。在对一千二百零四家农户作调查的过程中，陈翰笙不但指导具体工作，并且亲自组织和辅导调查团全体成员，学习《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著作。因此，通过三个月的调查，不仅获得了大量科学数据和材料，而且在调查过程中，一支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队伍开始萌芽。陈翰笙又用一年多时间，率领调查团把调查从长江流域推向冀中平原以及黄河流域和珠江流域，共二十四个县，还对另外五

十个县的三百三十五个村作了通信调查。终于，陈翰笙和调查团的同事们一起，运用调查获得的大量材料作出以下科学判断：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社会；二、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三、全国农民迫切要求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痛苦。结论是：必须废除封建土地，革命是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唯一出路。陈翰笙还撰写了《亩的差异》、《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中国南方农业问题》等许多高水平的专著，他还和钱俊瑞、薛暮桥、孙治方、王寅生、孙晓村以及千家驹、李紫翔等撰写出一篇又一篇论据充足的论文，同托派就中国社会和革命性质问题展开论战。从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工作上来了。

一九三三年，陈翰笙在上海邀约吴觉农、孙晓村、张稼夫、薛暮桥、钱俊瑞、孙治方等同志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陈翰笙当选为研究会的理事长。第二年出版了研究会的理论刊物《中国农村》月刊，薛暮桥任主编。抗战期间在南昌、武汉、长沙出版战时特刊时，仍由薛暮桥主编。在桂林出版时，先后由千家驹、姜君辰、张锡昌主编。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会员达五百多人，成为我国影响最大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农村经济研究团体。

· 虞耀麟 ·

陈翰笙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

当代经济学家中，为什么无锡人特别多？薛暮桥、孙治方、钱俊瑞、王寅生、张锡昌、秦柳方等，都是无锡人。无锡邻县也出经济学家，如江阴的姜君辰等。这当然同无锡地区早在民国初年经济和文化教育就比较发达有关。但无锡地区出这么多经济学家的直接原因，却是半个多世纪前，曾从无锡开始，进行过一次意义重大的农村经济调查。那次调查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是著名历史学家和农村经济学家陈翰笙。他，也是无锡人。

1897年2月出生于无锡一个教师家庭的陈翰笙，早年留学美国和德国。1924年他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应蔡元培校长聘请，到北京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并在李大钊和于树德的介绍下，参加了革命。1927年李大钊、高仁山、张挹兰被张作霖逮捕，陈翰笙被迫流亡苏联，在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工作。这期间，在第三国际和中共党内，发生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任务的大辩论。1928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确认“中国现在的地位是半殖民地”，其“政治经济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而国外托派分子和中国托派彭述之等，则认为中国居领导地位的已经是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已经取得完全的胜利，党和无产阶级应当放弃武装斗争。这是一场关系到中国命运的大是大非的辩论。

陈翰笙在莫斯科，曾亲自和农民运动研究所所长东方部长马季亚尔辩论中国农村性质问题。马季亚尔认为“中国早已进入资本主义”，陈翰笙则指出中国还是停留在商品资本阶段。在此之前，陈翰笙又曾于1927年初同蔡和森在北京彻夜长谈，从他那里了解到澎湃在海陆丰发动农民运动的情况，感到农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因此，1928年陈翰笙到上海，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职后，就

把调查我国农村经济，列为重要课题。

在调查开始之前，陈翰笙招考选聘人才和作好各种准备，然后于1929年7月至9月，率领四十五人的调查团，到无锡农村作调查。在对一千二百零四家农户作调查的过程中，陈翰笙不但指导具体工作，并且亲自组织和辅导调查团全体成员，学习《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著作。因此，通过三个月的调查，不仅获得了大量科学数据和材料，而且，一支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队伍也开始萌芽。陈翰笙又用一年多时间，率领调查团把调查从长江流域推向黄河流域和珠江流域，共二十四个县；还对另外五十个县的三百三十五个村作了通信调查。经费不足，他把兼任铁道部顾问所得的每月四百元薪水，全部资助农村调查。终于，从调查获得的大量材料进一步证明，中国农村仍处于半封建制度下，结论是：土地革命为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唯一出路。于是，陈翰笙和钱俊瑞、王寅生、薛暮桥、张锡昌、秦柳方、姜君辰、刘端生等农村调查的参加者，撰写出一篇又一篇论据充足的论文，同托派就中国社会和革命性质问题展开论战。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应用到农村经济的研究工作上来了。

1933年，陈翰笙在上海邀约吴觉农、孙晓村、张稼夫、薛暮桥、钱俊瑞、孙治方等同志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陈翰笙当选为研究会的理事长。第二年出版了研究会的理论刊物《中国农村》月刊，薛暮桥任主编。冯和法、骆耕漠、徐雪寒、石西民、千家驹等也先后参加了编辑工作。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会员达五百多人，成为我国影响最大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农村经济研究会。

本报记者 虞耀麟

无锡日报 85.4.23